

# 农产品价格扭曲：趋势和波动性，过去和未来

凯姆·安德森 ( Kym Anderson ) \*

阿德莱德大学经济学院，阿德莱德，SA 5005；CEPR；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rndt-Corden经济系，  
澳大利亚堪培拉

2012年4月22日收到；2012年11月16日收到修订本；接受2013年2月26日

## 抽象

从历史上看，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收入一直受到本国政策对城市的偏见，以及较富裕国家的政府偏向其农民以进口壁垒和补贴的压制。这两套政策都减少了全球经济福利和农业贸易，并加剧了全球不平等和贫困。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在减少高收入国家的农业保护和减少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障碍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价格扭曲仍然存在。同样，政府使国内食品市场免受国际价格波动的影响也没有减弱。这种隔离有助于扩大国际粮食价格的波动，然而，当粮食进口国和粮食出口国同样从事保温行为时，它对促进国家粮食安全几乎无济于事。因此，在通过多边协议改善全球经济福利方面，还有很大的余地，不仅可以消除剩余的贸易扭曲，而且可以在国际食品价格回升时制止各种贸易壁垒。本文在检查单方面或多边贸易安排以及可能有助于改善全球粮食安全成果的补充性国内措施之前，总结了农产品贸易壁垒的趋势和波动指标。因此，在通过多边协议改善全球经济福利方面，还有很大的余地，不仅可以消除剩余的贸易扭曲，而且可以在国际食品价格回升时制止各种贸易壁垒。本文在检查单方面或多边贸易安排以及补充性国内措施之前，总结了农产品贸易壁垒的趋势和波动指标，以及可能导致更好的全球粮食安全成果的国内补充措施。本文在检查单方面或多边贸易安排以及补充性国内措施之前，总结了农产品贸易壁垒的趋势和波动指标，以及可能导致更好的全球粮食安全成果的国内补充措施。

JEL分类：F13，F14，Q17，Q18

关键字：农民保护；出口税收；粮食价格上涨；贸易政策历史

## 1.简介

许多政府对最近国际食品价格上涨的反应使农产品价格和贸易政策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粮食进口发展中国家指责农产品出口国限制出口，加剧了对粮食安全的担忧，而其他出口商担心，这种限制将导致对国际市场的依赖退缩，因为当价格回升时，粮食匮乏的国家寻求更大的自给自足。趋势。同时，粮食进口国减少了进口限制，有几个国家甚至补贴了其主食的进口，加剧了国际粮食激增。

这些近期的短期反应及其可能带来的长期贸易保护主义后果，引发了一个问题，即政府过去如何应对国际食品价格趋势和波动。直到1980年代中期，这些价格一直存在着长期的下降趋势，除了1974年左右的峰值外，

然后是近20年的稳定期（Pfaffenzeller等，2007年），但随后似乎呈上升趋势，在2008年，2010/2011年和2012年末出现峰值。和尖峰。

几十年来，高收入（和一些中等收入）国家的农业保护和补贴一直压低农产品的国际价格，从而降低了发展中国家农民和相关农村企业的收入（Johnson，1991；Tyers和Anderson，

1992）。这些政策几乎肯定会加剧全球不平等和贫困，因为历史上至少有四分之一的世界最贫困人口直接或间接地依靠农业为其主要收入（Ravallion等，2007；世界银行，2007）。除了这种对发展中国家农民收入的外部不利影响之外，在过去的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本国政府都向他们征税。这不仅直接对农产品出口征税，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还对生产（实物）征税，以及通过实行替代进口的工业化战略（主要是限制制成品的进口和高估其汇率）间接地伤害农民（Krueger等，1988，1991）。这些扭曲价格的政策的另一个后果是

\* 通讯作者：电话：+61 8 8313 4712；传真：+61 8 8223 1460

电子邮件地址：kym.anderson@adelaide.edu.au（K. Anderson）

修订在国际农业经济学家协会（IAAE）三年一次会议上提交的全体会议论文，该会议于2012年8月18日至24日在巴西伊瓜苏举行。

他们减少了国际贸易的农产品数量。国际市场的这种“稀疏”意味着其价格比以前的价格波动更大，从而增加了农业政策的“绝缘”特征的影响力。

但是，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一直在改革其农业，贸易和汇率政策，从而降低了其反农业偏见，一些高收入国家也降低了其对农产品价格的支持，使其更容易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尽管各国之间以及每个国家内商品之间仍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扭曲现象，所以改革进程的继续仍将扩大农产品贸易，“增厚”国际粮食市场，从而不仅提高均值，而且降低价格波动在那些市场。此外，无论是高收入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农业政策的“绝缘”特征都没有减弱，

本文回顾了世界银行汇编并最近更新的关于农业激励扭曲的演变模式的证据。首先概述了该数据库中提供的经验指标，然后总结了自1950年代中期以来国家扭曲的趋势，然后回顾了政府对波动的反应及其对国际食品价格的影响。接下来，简要评估一下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结构的变化将如何影响未来一两年内与国家贸易相关的政策模式。本文的结论是，现在可以使用新的国内社会保护政策方案来减少发展中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

2.国家扭曲农产品价格的指标

为了评估自1950年代以来高收入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农民的激励机制如何演变，我们借鉴了世界银行最近的一项时间序列证据，该研究由安德森和瓦伦苏埃拉（2008）汇编，在安德森（2009）中进行了总结，并更新至2009 / 2010，作者：Anderson和Nelgen（2012b）。这些估算涵盖了82个国家，这些国家合计占全球农业，人口，就业，GDP和贫困的90%以上。关键指标是名义援助率（NRA），定义为**国家政府政策将农民的总收益提高到超出政府干预水平的百分比**，或者如果 $NRA < 0$ （有关方法的详细信息，请参阅Anderson等，2008）。

如果贸易措施是政府对特定产品进行干预的唯一来源，则所衡量的NRA也将是该产品价值链中同一点的消费者税当量（CTE）率。但是在还有国内生产者或消费者税或补贴的地方，NRA

CTE将不再相等，并且至少其中之一将不同于由于贸易措施而导致的边境价格扭曲。两者均以未失真价格的百分比表示。每个行业被归类为进口竞争或可出口产品的生产商，或被归类为不可贸易产品（其地位有时会随着几年的变化而变化），以便每年为两组不同的可贸易产品生成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在Anderson和Valenzuela（2008）的数据库中，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一数据涵盖了2004年，对于高收入和转型经济体而言，其数据涵盖了2007年。该数据库表明，NRA和CTE与所有国家中大多数产品的相关性都很高。因此，Anderson和Nelgen（2012b）仅在发展中国家的2009年更新中估计了生产者扭曲。对于高收入和转型经济体以及一些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该更新是在2010年进行的，并且与较早的Anderson / Valenzuela数据库一样，该更新基于OECD（2011年）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支持估算。

NRAestimates产品的覆盖率平均为每个国家/地区农业生产总值的70%。国家案例研究的作者还为未发现的农产品提供了NRA的“猜测”。然后将所有农产品的加权平均数，以无辅助价格的生产总值作为权重。对于也提供非特定产品的农业补贴或税收（假设在可交易产品和非可交易产品之间按比例分配的国家）的国家，则将这种净援助添加到特定产品的援助中，以获得整个农业的NRA。还提供了所谓的脱钩措施，但作为单独的附件，例如原则上不会扭曲价格的全农费。

农民不仅受到自己产品价格的影响，还受到非农业生产者面临的激励措施的影响。**那就是 相对的价格，因此 相对的影响生产者激励措施的政府援助率**（Lerner，1936；Vousden，

1990年，第46-47页）。如果假定非贸易品市场没有扭曲，而农业和非农业非贸易产品的价值份额保持不变，那么可以通过扭曲贸易的可交易部分的程度来捕捉扭曲农业对整个经济的影响。相对于非农业贸易产品的生产者，农业生产得到了辅助或征税。通过生成非农业贸易品的平均NRA估算，然后可以计算相对援助率RRA，以百分比的形式定义为：

$$RRA = 100 [ ( 1 + NRA_{ag} / 100 ) / ( 1 + NRA_{nonag} / 100 ) - 1 ] ,$$

**在哪里** $NRA_{ag}$ **和** $NRA_{nonag}$ **分别是农业和非农业部门可贸易部分的加权平均净现值百分比**。如果这两个部门得到同等的协助，则RRA为零；如果低于零（高于零），则表示

一个国家的政策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反农业偏见 ( Anderson等, 2008 )。<sup>1†</sup>

在总结该世界银行研究的相关经验发现时, 从对农业部门的NRA估算开始, 然后转向RRA估算是有帮助的。

## 2.1。全国扭曲农民激励措施: 1950年代中期以来的趋势

1950年代, 日本和欧洲共同体的国内价格都超过了谷物和牲畜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 尽管不到40%。但是, 到1980年代初, 日本的差异超过80%, 而欧共体的差异仍然约为40%, 而对大洋洲和北美的农业出口大国而言, 这一差异仍接近于零 ( Anderson等, 1986 )。表2.5)。实际上, 在那个时期对日本和欧洲农民的所有援助都是由于对农产品进口的限制。

自1986年以来, 经合组织一直在为其成员国计算年度生产者支持和消费者支持估算 ( PSE和CSE ) ( OECD, 2011 )。对于整个群体来说, 生产者的支持在1986-1988年至2008-2010年之间以美元计价增长 ( 从239美元增至2460亿美元 ), 但是, 以包括农民在内的包容性回报的份额表示, 则下降了 ( 从37 %至20% )。由于支持手段的某些变化, 包括转向基于非当前生产或基于长期资源报废的措施, 通过市场价格支持措施提供的援助份额已从四分之三降至一半。如果将PSE付款表示为不失真价格的百分比 ( 使其像NRA ), 则从1986-1988年到2008-2010年, 下降幅度从59%下降到25% ( OECD, 2011年 )。

对于东北亚以外的发展中国家, 直到最近, 在一段时间内, 有关改革的主要综合估算是在改革广泛普及之前的时期。它们是Krueger等人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中期对18个发展中国家进行的一项重大研究的一部分。 ( 1988, 1991 )。世界银行的这项研究, 其估计值在Schiff和Vald'中进行了总结

es ( 1992 ) ,

结果表明, 农民面临的激励措施低迷仅部分是由于各种形式的农产品价格和贸易政策, 包括对粮食进口的补贴。在许多情况下, 更重要的是那些间接损害农民的发展中国家的非农业政策。两个关键因素是制造业保护主义 ( 从农业到工业部门吸引资源 ) 和

高估的汇率 ( 将资源吸引到生产非贸易品的部门, 例如服务 )。

由安德森 ( Anderson ) 和内尔根 ( Nelgen ) ( 2012b ) 更新的最新的世界银行数据库, 涵盖了45个发展中国家, 还涵盖了13个欧洲转型经济体以及24个高收入国家。这项研究的结果<sup>2</sup>确实表明, 在过去的两到三十年中, 发展中国家对农业激励措施的扭曲已大大减少。他们还表明, 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进步并不一致, 而且改革进程还远远没有完成。更具体地说, 许多国家的NRA对于不同的农业产业仍然分布广泛, 尤其是在其农业部门的援助结构中存在强烈的反贸易偏见。从某种意义上说, 有些国家已经“过头了”, 即它们已经从平均RRA转移到了农民的负值, 再到正值的农民, 而不是以福利最大化的零率停止。此外, 每个国家/地区内不同商品的援助率以及国家/地区的总费率之间存在差异,

这些新结果的全球摘要在图1中提供。它揭示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1980年代末, 高收入国家农民的NRA稳步上升, 而国际食品价格在1973-1974年间飙升。在1980年代中期国际食品价格接近创纪录的低点时达到50%以上的峰值之后, 高收入国家的平均净资产价值大幅下降。即使包括新的农场计划, 即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些计划已“脱钩”, 从某种意义上讲, 这些计划都不再影响生产决策, 也是如此。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 农业的平均净可再生资源也已接近于零, 但从195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初的大约25%的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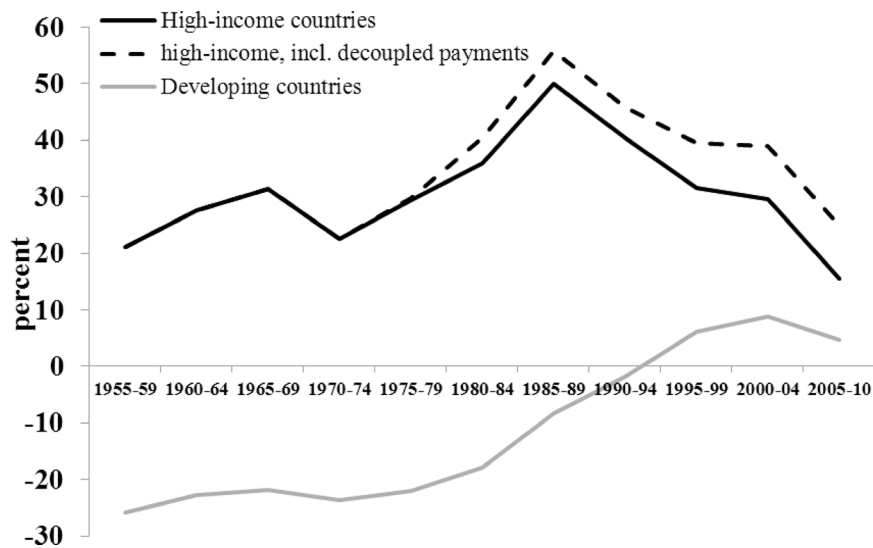
发展中国家的平均NRA掩盖了农业的出口和竞争竞争的NRA的事实。尽管发展中国家出口商的平均NRA一直为负 ( 从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50%降至几乎为零 )。在2000年至2009年期间, 发展中国家针对进口竞争的农民的NRA呈上升趋势, 从10%和30%上升 ( 在1980年代中期国际价格低迷的年份甚至达到40% )。这表明, 在发展中国家, 以出口为重点的农民仍然在两个方面受到歧视: 援助的反贸易结构

<sup>2</sup> Anderson ( 2009 ) 对2007年的结果进行了全球概述, 详细的国家案例研究报告了四个区域, 涉及非洲 ( Anderson and Masters, 2009 ), 亚洲 ( Anderson and Martin, 2009 )。

2009年), 拉丁美洲 ( 安德森和瓦尔德 ) es, 2008 ) 和欧洲的转型经济 ( Anderson和Swinnen, 2008年 )。背景文件和数据库, 包括有关Anderson和Nelgen ( 2012b ) 的最新估算, 可以免费下载到[www.worldbank.org/agdistortions](http://www.worldbank.org/agdistortions), 也可以免费下载区域卷的电子书版本。将这些估算值与Krueger, Schiff和Vald'的早期估算值进行比较

es可在Anderson ( 2010 ) 中找到。

<sup>1†</sup> 在计算农业和非农业贸易产品生产者的净资产利润率时, 该方法还包括基于Dervis等人的双重或多重汇率产生的隐性贸易税扭曲。 ( 1981 )。



— 五年加权平均值，虚线中包含解耦的付款。中欧和东欧以及中亚（ECA）的非欧盟转型经济体被包括在高收入国家组中。

资源：安德森（2009年，第1章），根据安德森和内尔根（2012b）的估算值进行了更新。

图1.高收入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农业NRA，— 1955年至2010年（百分比）。

在自己的农业部门范围内，高收入国家的农民仍然受到保护。这种反贸易的偏见也反映了更广泛的事实，即国家监管机构在商品之间并不统一，这反过来表明每个国家农业部门内的资源都没有得到最佳利用（Lloyd，1974）。由于每个重点国家所涵盖产品中NRA的标准差，该超低效率的程度超出了该行业中由于总资源太多或太少而导致的效率低下的程度。在整个覆盖期间内，该分散指数在43%至60%之间波动，并且并未因为NRA在过去25年中接近零而减少（Anderson，2009，表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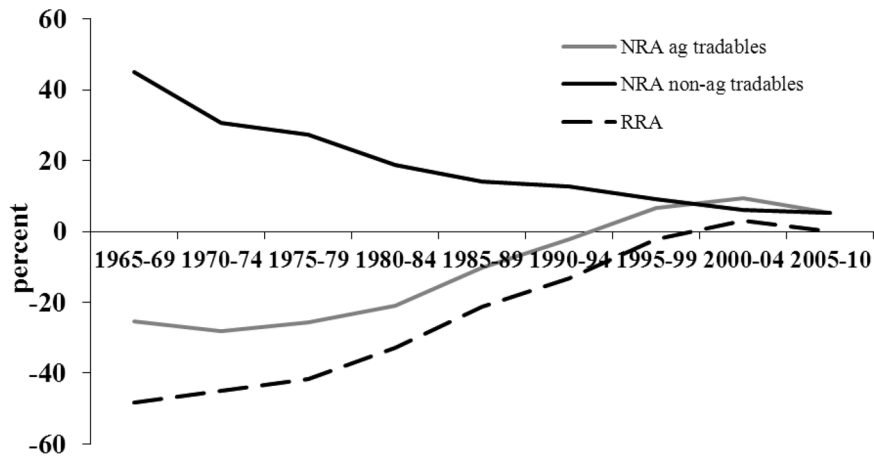
上述NRA估算低估了发展中国家农民的激励措施，因为这些国家也减少了对非农业可贸易产品生产商的援助，尤其是制造业。如图2所示，后者的加权平均NRA的下降明显大于可交易农业部门在1980年代中期之前的平均NRA的增长，这与Krueger等人的发现一致。（1988，1991）。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这两个部门的NRA的变化几乎都对改善农民激励措施做出了同等贡献。整个发展中国家的NRA从1970年代下半年的-46%上升到本世纪前十年的零以上。这种增加（从0.54的系数增加到1.01）相当于农产品的相对价格几乎翻了一番，这是发展中国家农民一代人的命运发生的巨大变化。但是，必须牢记，在发展中国家集团内部，

国家NRA估算的范围仍然很广（图3），表明进一步的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仍可为全球经济福利带来巨大的收益。这种改革不仅将提高实际收入的平均水平，而且还将通过“增厚”国际食品市场来减少国际食品价格的波动：根据Valenzuela等人报告的全球经济范围内的建模结果。（2009年），从2004年开始放开剩余的贸易壁垒，将使全球出口的农业生产份额从8%提高到13%。此外，根据一项后续研究，该研究使用了许多全球和国家经济范围的模型（均已校准至2004年），并纳入了与世界银行对国家价格扭曲的估计相同的后续研究（Anderson et al.，2010，2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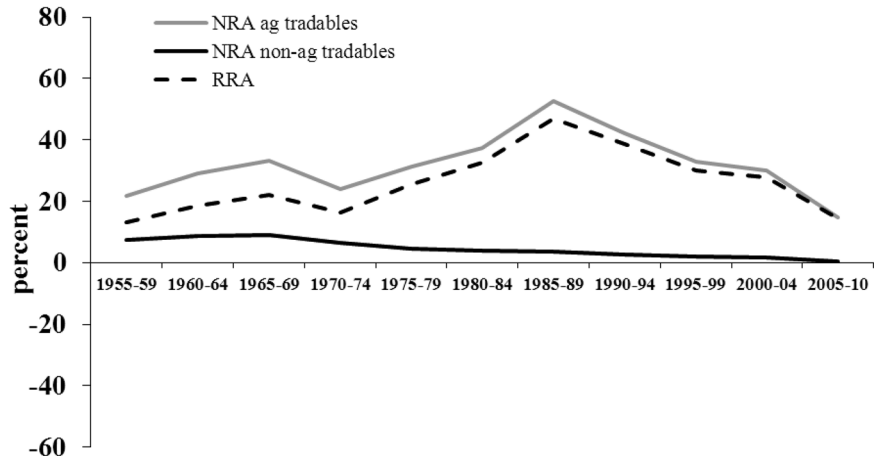
## 2.2. 政府对国际食品价格波动和上涨的反应

各国政府显然不喜欢国内食品价格的波动，因为它们往往围绕国际食品价格的趋势水平传递的波动少于全部波动。这种趋势意味着每种产品的估计净资产价值率（国内价格超过边界价格的百分比）也在其长期趋势附近逐年波动，并且与国际价格相反。作为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的与贸易有关的政策改革的一部分，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高收入国家，这种倾向都没有减弱（Anderson和Nelgen，2012a）。为了估计在12个月内传递到国内市场的任何国际价格波动的比例，Anderson和Nelgen（2012c）遵循Nerlove（1972）和Tyers和

(a) Developing countries



(b) High-income countries



— 计算使用了各个国家/地区的农业生产加权平均值。RRA定义为  $100 \times [(100 + \text{NRA}_{\text{ag}}) / (100 + \text{NRA}_{\text{nonag}}) - 1]$ ，其中  $\text{NRA}_{\text{ag}}$  和  $\text{NRA}_{\text{nonag}}$  分别是农业和非农业部门可交易部分的NRA。

资源：安德森（2009年，第1章），根据安德森和内尔根（2012b）的估算值进行了更新。

图2.发展中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农业和非农业可贸易部门的NRA和RRA，— 1955年至2010年（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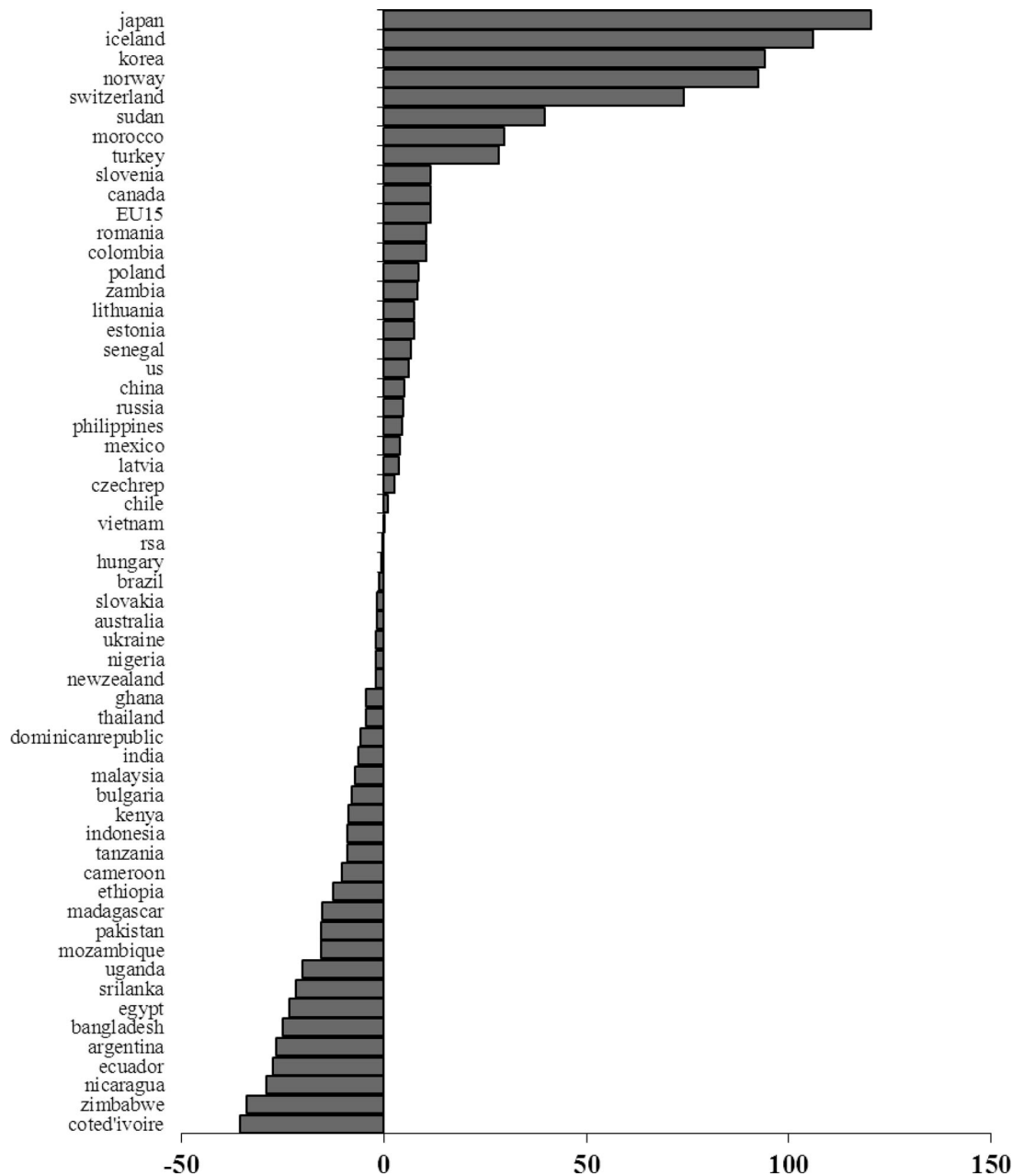
安德森（1992，第65-75页）使用局部调整的几何分布滞后公式来估算1985-2010年期间所有重点国家的九种主要贸易食品中的每一种的短期传递弹性。这些弹性估计值从大豆的0.73到糖的0.43不等。这九种产品的未加权平均值为

0.56，表明在一年之内，初级食品国际价格的波动几乎只有一半转移到了国内市场。

当一些政府改变其食品贸易措施的限制条件，以使其国内市场与国际价格波动有所隔离时，其他国家所面临的动荡就被放大了。因此，这种反应促使更多国家效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食品出口国和食品进口国都做出回应时，

每个国家集团破坏了对方稳定国内市场的企图。也就是说，这似乎是解决每个进口（或出口）国家关注的问题的解决方案。如果它独自行动，事实证明效果不佳，更多的出口（或进口）国家以类似的方式做出反应（大概是出于相同的政治经济学原因）。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这一点，Martin and Anderson（2012）考虑了这样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库存不足时发生的严重天气冲击导致国际食品价格突然上涨。如果各国政府希望避免国内食品消费者遭受损失，而他们通过改变食品贸易限制（提高出口税或降低进口关税）来避免损失，那么价格上涨中只有一小部分会传导到其国内市场。该回应提高了消费者补贴当量/降低了任何此类贸易措施的CTE，并且确实



→ 有关RRA的正式定义，请参见文字和图2。

资源：基于Anderson和Valenzuela ( 2008 ) 中的RRA估算。

图3.对农民的相对援助率 ( RRA ) ， → 2000-2004年按国家划分的百分比。

与生产者激励相反。但是，如果在世界上食品出口国和食品进口国中有类似比例的国家采用贸易措施来隔离市场，那么在保持国内价格波动低于国际市场水平的情况下，事实证明这不是非常有效。没有政府如此回应。相反，就像拥挤的体育场内的每个人都站起来观看更好：平均而言，任何聚会都不会变得更好。

对政府贸易政策对国际价格飙升 ( 例如2006-2008年 ) 的比例贡献做出的估算。关键谷物的最新估计值是水稻为0.40，小麦为0.19，玉米为0.10 ( Anderson和Nelgen, 2012c ) 。可以在国家组之间分配这些政策贡献。表1报告了高收入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贡献，以及出口国对进口国的贡献。2006年—

Martin and Anderson ( 2012 ) 也指出，借助一些简化的假设，至少有可能得到

2008年，在所有三种谷物价格暴涨的政策贡献中，大部分是由发展中国家承担，而



表格1  
1972–1974年和2006–2008年，由于政策导致的贸易壁垒变动，高收入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进出口国家对国际价格变动的贡献

	总 成比例的 贡献贡献贡献贡献贡献	高收入 国家的 贡献贡献贡献贡献贡献	发展 国家的 贡献贡献贡献贡献贡献	进口 国家的 贡献贡献贡献贡献贡献	出口 国家的 贡献贡献贡献贡献贡献
1972–1974年					
白饭	0.27	0.04	0.23	0.10	0.17
小麦	0.23	0.15	0.08	0.18	0.05
玉米	0.18	0.14	0.04	0.06	0.12
2006–2008年					
白饭	0.40	0.02	0.38	0.18	0.22
小麦	0.19	0.09	0.10	0.07	0.12
玉米	0.10	0.05	0.05	0.03	0.07

注意：做出的贡献表示为，每对随后的两对列中的两个数字加到每行第1列中所示的总比例中。

资源：Anderson和Nelgen ( 2012c )。

表2  
2006-2008年国内价格上涨与国际谷物价格上涨的比较，扣除贸易限制变化，稻米，小麦和玉米的贡献（百分比，未加权平均值）

	国际价格上涨包括		国内价格上涨		
	贡献 的变化 贸易限制	净 贡献 的变化 贸易限制国家国家	所有		
			发展	高收入	国家
白饭	113	68	56	48	74
小麦	70	56	77	65岁	81
玉米	83	75	73	62	82

资源：Anderson和Nelgen ( 2012c )。

在1972年至1974年，情况恰恰相反，除了大米。对于出口商与进口商，似乎出口商的政策影响最大，除了1970年代的小麦外，但进口商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根据这些估计，也有可能了解贸易限制的变化在限制国内价格上涨方面的有效性。国际价格成比例上升

净表2第二栏中报告了变化的贸易限制的贡献乘以国际价格上涨后的结果，并将其与样本国家国内价格的按比例上升进行了比较。2006-2008年的数据表明，样本中所有国家的平均国内价格涨幅均比调整后的国际小麦价格涨幅略高，而玉米的涨幅仅略少，大米的跌幅仅为六分之一。这些结果表明，各国政府的综合反应已被充分抵消，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使国内市场与最近的国际粮食价格上涨相隔离。

2.3。未来一两年内贸易政策将如何发展？

基于上述见解，现在有可能转向一个问题，即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结构的变化将如何影响未来几年与国家贸易有关的政策模式。全球金融

欧洲的危机和持续的经济衰退似乎将确保新兴经济体将继续比高收入国家更快地增长。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在中国和印度的带动下，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出口中所占份额的快速增长（翻了一番）看起来也正在持续，南南贸易的相对重要性也在增长（亚行，2011；Anderson和Strutt，2012a，2012b；Hanson，

2012）。这些新兴经济体的工业化正在加深全球生产网络，并促进了中间投入品的贸易，但它仍在继续推动对包括能源生产在内的农产品和工业原料的强劲需求。如果这样，再加上全球碳排放税的缓慢增加，却使化石燃料价格如预期般保持在目前的高水平，美国和欧洲联盟可能会出于能源自给自足的原因而保留其生物燃料补贴和强制性规定。这意味着食品和燃料的价格将在高度和波动性两方面保持紧密联系（Hertel和Beckman，2011年）。由于气候变化，粮食生产的可变性预计也会增加。

在国际粮食市场上粮价持续保持历史高位和变化的情况下，人们对农业援助率的趋势和波动性有何期待？从NRAs的长期趋势来看，如果国际食品价格居高不下，那么高收入国家就不太可能回到其原来的农业保护增长之路。但是，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中的人民和政府（尤其是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大型经济体）可能会感到更加缺乏粮食安全，因为随着食品和饲料需求的增长，农业部门的竞争力减弱了。因此，即使国际食品价格居高不下，也不能排除其农业保护的持续增长（Anderson和Nelgen，2011年）。<sup>3</sup>从而破坏了除粮食净卖主以外的所有家庭的粮食安全。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后一组将在人口和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但是在这些国家中，它们是否会在穷人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是很难预料的。因此，尚不清楚农业保护的增长对这些国家和其他国家的国民贫困率会产生什么影响。当然，他们的人均粮食消费增长不会很快，而其农业保护的增长也会在某种程度上抑制国际粮食价格。

至于NRA中的趋势变化，过去的行为使人们期望高收入国家政府和发展中国家政府继续改变其食品贸易限制，以使其国内市场与国际食品价格的波动有所隔离。由于前面所述的原因

<sup>3</sup>对于中国来说，这种趋势已经很明显：其农业NRA从—在1999年至2010年之间为3%到21%（Anderson和Nelgen，2012b，根据OECD的PSE估算，2011年）。这足以维持除大豆以外的所有主要农产品的自给自足（大豆的关税在世贸组织中为3%，而且大部分用于牲畜饲料，因此有助于维持肉和奶的明显自给自足）。

在本节中，这种行为将继续扩大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波动，并且，如果出口国和进口国都继续做出类似反应，那么这种干预将在防止国内食品价格波动方面仍然相当无效。这种波动的严重程度将取决于对世界粮食市场的任何意料之外的外来冲击的大小，以及在任何此类外来冲击时受影响产品的全球库存与使用比率。如果在重要地区收成不佳时库存很低，那么粮食价格将在中期中期飙升。

如果各国在此期间未达成多边协议以制止改变其贸易限制，则很可能会重演2008年，2011年初和2012年中期。

#### 2.4。政策影响

上述经验证据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国家贸易限制至少通过两种方式非同寻常地增加了国际食品价格的波动性：通过“变薄”国际食品市场，以及通过使国内食品市场与国际价格波动“隔离”。这些政策属性共同放大了全球粮食供求的任何冲击对国际价格的影响。

第一个（“细化”）问题的解决方案在经济上，甚至在政治上都不是简单的：各国应进一步开放其市场进行食品贸易。如果各国可以同意多边开放其粮食和农业市场，并在开放非农业市场的同时做到这一点，那么与此相关的政治困难和调整成本将被最小化。这就是在乌拉圭回合中发生的事情，这是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通过其多哈发展议程（DDA）所追求的。经过十多年的谈判，DDA陷入停顿。尽管前景似乎黯淡（见Bureau和Jean，2012年），但仍有一些希望可以恢复谈判。与此同时，

第二个（“绝缘”）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也涉及WTO。在一个多国家的世界中，从以上分析可以明显看出，单个国家的贸易政策行动可以被其他国家的贸易政策抵消，以至于干预措施无法有效实现其降低国内食品价格波动的既定目标。这是一个经典的国际公益问题，可以通过多边协议来限制贸易限制的变化来解决。

在当前的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中，有人提出了逐步取消农业出口补贴以及降低进口关税约束的提议，这两者都将有助于使国际粮食价格更加稳定。然而，迄今为止，扩大多哈议程以引入有关出口限制的纪律的提议一直很难获得人们的关注。

无论WTO成员国是否放开其粮食贸易，并对进出口以及低水平或零水平的进口征收贸易税，国际食品价格仍然有可能飙升，这引发了一个问题，即政府可以使用哪些替代手段为社会中重要群体避免损失。经济学家的标准答案是，消费者的食品安全，尤其是穷人的食品负担能力，最好使用通用的社会安全网措施来抵销，这些措施可以抵消对穷人（包括净卖家）的各种不同冲击的不利影响。作为食品的净购买者，而不会造成使用过程中必然伴随的昂贵的副产品扭曲，最佳的社

得益于数字信息和通信技术（ICT）的革命，如今，这个标准答案的功能远不如几年前。过去，人们经常声称，由于涉及的财政支出和管理此类补助的高昂费用，在贫困国家无法支付此类款项。但是，请回想一下，在先前考虑的一半情况下，政府降低他们的贸易税率，因此，即使要进行干预，也可能需要消耗许多财政部门的预算。无论如何，在过去的一两个十年中，即使是低收入国家，使用增值税代替贸易税来增加政府收入的选择也成为惯例。此外，ICT革命使得有条件现金转移可以电子方式提供给偏远和小型家庭，甚至是这些家庭中最弱势的成员，特别是妇女及其年幼子女（见

例如，Adato和Hoddinott，2010年；Fiszbein和Schady，2009年；Skoufaas等，2010）。

如果各国仍然不满意农民对国家粮食安全的贡献（如粮食自给率所反映的那样），或者感到自己的农民因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的利益而错过了？同样，农业进口保护措施远非解决这些社会政治问题的最佳方法。替代措施包括补贴对农业研发，农村教育和卫生以及道路和其他农村基础设施改善的投资。如果这些投资的社会回报率目前很高，并且高于私人回报率（在发展中国家通常如此），那么扩大此类投资在经济上将是有利的。决定那些关键农业投入物的产权和价格的土地和水利机构的改善也可以。此类投资几乎可以肯定会减少贫困并增强粮食安全，包括通过增加农业净收入，同时降低城镇和城市食品的消费价格。

鼓励各国从贸易转向解决非贸易国内问题的国内政策工具的挑战显然是微不足道的。然而，总结的证据表明，在



过去的三十年。幸运的是，涉及有条件现金电子转移的新型，低成本社会保护机制的出现，可能使政府远离以乞讨为邻的贸易措施。

致谢

感谢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农村产业研究与发展公司和世界银行提供的财政援助。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参考文献

Adato, M., Hoddinott J. ( 编辑 ) , 2010年。拉丁语中的有条件现金转移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巴尔的摩医学研究所。亚行，2011年。《2011年亚洲发展展望》( 4月 ) 。亚洲发展  
银行，马尼拉。

安德森 ( 美国 ) , 2009年。《农业激励机制的扭曲：全球  
透视，1955-2007年。伦敦的Palgrave Macmillan和华盛顿特区的世界银行。

安德森 ( K. Anderson ) , 2010年。克鲁格/席夫/瓦尔德 es再访：农产品价格和  
自19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改革。应用 经济。透视。政策32 ( 2 ) , 195-231。

Anderson, K., Cockburn, J., Martin, W. ( 编 ) , 2010年。  
侵权，不平等与贫困。世界银行，华盛顿特区。Anderson, K., Cockburn, J., Martin, W., 2011  
。将释放世界贸易  
减少贫困和不平等？农业扭曲的烦人作用。世界经济。34 ( 4 ) , 487-515。

安德森 ( K. ) 安达森 ( K. ) , Hay见 ( Yahami ) , 1986年。  
tection：国际视野中的东亚。艾伦和温温，伦敦。Anderson, K., Kurzweil, M., Martin, W., Sa  
ndri, D., Valenzuela, E., 2008。  
重新评估了农业激励措施的扭曲。世界贸易修订版7 ( 4 ) , 1-30。

Anderson, K., Martin, W. ( 编辑 ) , 2009年。对农业激励措施的扭曲  
在亚洲。世界银行，华盛顿特区。

Anderson, K., Masters, W. ( 编辑 ) , ( 2009年。对农业激励措施的扭曲  
在非洲。世界银行，华盛顿特区。

安德森 ( Anderson, K. ) , 内尔根 ( Nelgen ) , S., 2011年。什么是适当的农业保护措施  
反事实贸易分析？在：马丁·W·马丁·图图·A. ( 编辑 ) , 《多哈发展议程：评估》中。经济政策研究  
中心和世界银行，伦敦，中国 13，第325-54页。Anderson, K., Nelgen, S., 2012a。贸易壁垒波  
动和农产品价格  
  
稳定。世界开发 40 ( 1 ) , 36-48。

Anderson, K., Nelgen, S., 2012b。最新的国家和全球估算  
1955年至2010年对农业激励措施的扭曲。世界银行，华盛顿特区。[可在www.worldbank.org/agdis  
tortions上访问] Anderson, K., Nelgen, S., 2012c。全球范围内的农业贸易扭曲  
  
金融危机。Oxf. 修订版 政策28 ( 2 ) , 235-60。

Anderson, K., Strutt, A., 2012a。不断变化的世界贸易地理：亲  
到2030年。J. Asian Econ. 23 ( 4 ) , 303-23。

Anderson, K., Strutt, A., 2012b。南美对世界粮食的贡献  
市场：GTAP到2030年的预测。IATRC / IAAE全球化，宏观经济失衡和南美作为世界粮食篮子的会  
前会论文。8月18日至24日，巴西伊瓜苏，福斯。

Anderson, K., Swinnen, J. ( 编辑 ) , 2008年。对农业激励措施的扭曲  
在欧洲的转型经济体中。世界银行，华盛顿特区。

安德森 ( K. ) , 瓦尔德 ( Vald' ) es, A. ( 编辑 ) , 2008年。  
拉丁美洲。世界银行，华盛顿特区。Anderson, K., Valenzuela, E., 2008年。全球对农业的扭曲  
估计  
激励政策，1955年至2007年。世界银行，华盛顿特区。[可从www.worldbank.org/agdistortions访问  
]  
Bureau, J.-C., Jean, S., 2012年。《生物经济中的贸易自由化：缔约方会议  
焕然一新。在IAAE三年期会议上发表的全体会议论文。8月18日至24日，巴西伊瓜苏，福斯。Derv  
is, K., de Melo, J., Robinson, S., 1981。一般均衡分析  
  
发展中国家的外汇短缺。经济。J. 91, 891-  
906。

Fiszbein, A., Schady, N. ( 与FHG Ferreira, M. Grosh, N.Kelleher, P.  
Olinto和E. Skoufaas, 2009年。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减少当前和未来的贫困状况。世界银行政  
策研究报告，华盛顿特区。汉森，GH, 2012年。中等王国的崛起：新兴经济体  
  
全球交易。J.Econ. 透视。26 ( 2 ) , 41-63。TW, Hertel, J., Beckman, J., 2011。生物燃料时  
代的商品价格波动：  
考察能源与农业市场之间的联系。在：Graff Zivin, J., Perloff, J. ( 编辑 ) , 《意料之外的影响  
》中，  
美国农业和生物技术政策。芝加哥大学NBER出版社，芝加哥 6，第189-221页。约翰逊，DG，19  
91年。《世界农业混乱》。修订版。圣  
  
伦敦马丁出版社。Krueger, AO, Sch  
iff, M., Vald' es, A., 1988。发展中的农业激励措施-  
国家：衡量部门和经济政策的效果。世界银行经济。修订版2 ( 3 ) , 255-272。Krueger, AO ,  
Schiff, M., Vald' es, A., 1991。《农业的政治经济学》 ,  
定价政策，第1卷：拉丁美洲，第2卷：亚洲，第3卷：非洲和地中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世  
界银行，马里兰州巴尔的摩。

Lerner, A., 1936年。进出口税之间的对称性。经济型  
3 ( 11 ) , 306-313。  
劳埃德 ( Lloyd, PJ ) , 1974年。开放式经济中价格扭曲的更一般理论  
omy J.国际 经济。4 ( 4 ) , 365-86。

Martin, W., Anderson, K., 2012年。出口限制和价格绝缘  
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上午。J.艾格里克。经济。94 ( 2 ) , 422-427。Nerlove, M., 1972年。经济行  
为方面的滞后。Econometrica 40 ( 2 ) , 221-  
252。

经合组织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 , 2011年。  
生产者和消费者支持估计。网址：www.oecd.org，2012年7月11日访问。

Pfaffenzeller, S., Newbolt, P., Rayner, A., 2007年。有关更新的简短说明  
格里利和杨的商品价格指数。世界银行经济。修订版21 ( 1 ) , 151-63。

Ravallion, M., Chen, S., Sangraula, P., 2007。关于城市化的新证据  
贫穷。人口发展 修订版33 ( 4 ) , 667-702。Schiff, M., Vald' es, A., 1992。农业定价的政治经济学  
政策，卷。4：发展中国家经济学的综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世界银行出版社，马里兰州巴尔的摩。  
Skoufas, E., Tiwari, S., Zaman, H., 2010年。我们能否依靠现金转移支付来  
  
食物危机期间是否有饮食多样性？来自印度尼西亚的估计。政策研究工作文件5548，世界银行，华  
盛顿特区。Tyers, R., Anderson, K., 1992年。《世界食品市场的混乱》：定量分析  
  
评定。剑桥大学出版社，剑桥和纽约。Valenzuela, E., van der Mensbrugghe, D., Anderson, K  
, 2009年。  
价格扭曲对全球市场，农场收入和福利的影响。载于：Anderson, K. ( 编辑 ) , 《农业激励政策的  
扭曲：全球视角》，1955-2007年。Palgrave Macmillan，伦敦和世界银行，华盛顿特区。

Vousden, N., 1990年。《贸易保护经济学》。剑桥大学  
剑桥出版社。  
世界银行，2007年。《2008年世界发展报告：农业促进发展》 ,  
精神。世界银行，华盛顿特区。